

鲁迅的光辉人格

易竹贤 皮远长

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了。他为中华民族和劳苦大众的解放而英勇奋战的一生,他那崇高的精神和光辉人格,和他的卓越思想与不朽著作一样,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鼓舞人、激励人、感化人的巨大精神力量。著名作家巴金曾经这样描述过鲁迅人格的魅力:

站在他面前,你觉得你接触到一个光辉的人格,他的光芒照透了你的心,你的一切个人的打算都消失了。你不能不尊敬他,不能不爱他,你不能不爱他的思想,你会因为你是他的朋友、他的同志而感到幸福,你会极力把自己变好来使他高兴……^①

今天,我国各族人民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上来纪念我们民族的这位巨人,就是要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而阐明鲁迅的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学习他的光辉品格,对于我们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具有重要的楷范的意义。

—

中华民族是有着古老的文明而又富于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伟大民族。到了近代,在列强侵袭和清王朝衰败造成的危殆时局下,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加激越发扬,涌现出了许多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抗争的爱国志士与民族英雄。鲁迅就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哺育和时代的砥砺下而成长

的伟大爱国者和空前的民族英雄。

列宁曾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②年青的鲁迅,就是在这种感情的驱策下踏上自己的人生征途的。时当清朝末季,正是祖国极度衰败、贫穷、落后而又黑暗的年代。鲁迅对如此贫穷落后的祖国,既不是嫌弃,也不是抱怨,而是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为己任。他同当年许多爱国的先进分子一样,为了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东渡留学。他这时写下的《自题小象》一诗,表达了他身居异域,遥念“风雨如磐”、灾难深重的祖国的一往深情,抒发了自己以身许国、“血荐轩辕”的伟大爱国情怀。

“我以我血荐轩辕”,代表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们的共同心声。鲁迅革命的一生,也就是在不断地、而终于圆满地实践了他对祖国的这一庄严誓愿。他早年赴日本学医,继而弃医从文,探讨“国民性”,呼唤“精神界之战士”,致力于对民众的思想启蒙;回国后热情参加并颂赞辛亥革命,又为其失败而深怀忧虑;及至“五四”前后,他投身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运动,以文学为武器,从事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等等,无不是为实现挽救祖国危亡、争求祖国解放这个爱国主义的伟大目标。鲁迅晚年,在白色恐怖包围中,又重病缠身,处境十分险恶。许多友人都劝他出国疗养,并为此作了种种安排。但是鲁迅经反复考虑,终因“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裾

径去，野人怀土，小草恋山”，^③对祖国乡土的深情爱恋，使他不忍暂离。更重要的是，他要坚守岗位，为祖国战斗。他说：“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就不能写作了。”^④对祖国解放事业的强烈责任感，更使他不能舍去。就这样，鲁迅忠诚地为祖国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⑤因此，中华民族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只有同反对帝国主义的现实要求结合起来，才具有新的生命力和战斗力。鲁迅既是伟大的爱国者，同时也是坚强的反帝战士。而且，由于他对帝国主义的深刻认识，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更富有战斗的锋芒。他很早就揭露过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武力侵占和经济掠夺，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国力的贫弱。因此，面对清王朝的“老病昏聩”和列强的虎视眈眈，鲁迅大义凛然地宣告：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检；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覦者也。^⑥

鲁迅的声音，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严正立场。“五卅”运动中，鲁迅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文明”的残酷本质，主张“抽刀而起，要求‘以血偿血’”，把反帝斗争一代一代地坚持下去。^⑦三十年代，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侵略威胁，鲁迅明确指出：“现在中国人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⑧抗战前夕，鲁迅不顾托派的恶意中伤和严重的白色恐怖，毅然公开宣布：拥护并且“无条件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鲁迅终其一生，保持了坚决的、彻底的反帝立场，尤其可贵的是，他从未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抱丝毫幻想。这是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对祖国诚挚深沉的爱，和对民族敌人的

强烈的恨，是鲁迅爱国主义精神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为了维护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鲁迅批判的笔锋扫荡了一切民族的丑类。对于历届反动政府，从清王朝到蒋介石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和措施，鲁迅都作过无情的揭露和伐挾。“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鲁迅写下了大量犀利的杂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和不抵抗主义，指出其勾结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实质，是清朝“宁赠友邦，不给家奴”卖国口号的翻版。鲁迅以民族自尊的愤火，痛斥过一心媚外、甘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洋奴买办文人，如陈西滢、徐志摩、胡适之流；批判过盲目崇拜外国、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种种“西崽相”。确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在他的言行中，没有丝毫狭隘的爱国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鲁迅一贯同情和支持所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对一切以强凌弱的侵略、霸道行径。他早年就斥责那些“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者为“兽性爱国之士”。^⑨到了后期，鲁迅的这种思想，便发展为鲜明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正是出于这种博大的国际主义胸怀，鲁迅珍视世界各民族创造的进步文化，并且大量译介，博采众长，以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他提出的著名的“拿来主义”，就集中体现了他放眼世界、容纳新知的远大眼光和恢宏气魄。因此，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在鲁迅身上是和谐地统一着的。

鲁迅曾经无限自豪地说：“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⑩鲁迅的爱国主义，不仅表现在他以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而骄傲，而感到无上光荣；更重要的表现在他深知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对

祖国民族应尽的神圣职责和义务，而且以毕生精力自觉地履行了这种职责和义务。鲁迅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他伟大人格的最光辉的部分，永远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学习的典范。

二

鲁迅的崇高人格和道德的另一最光辉的方面，是他无限地热爱人民、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他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深刻概括了他对人民的伟大的爱和对敌人的伟大的憎，恰切地表达了他勤勤恳恳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精神。

我们知道，鲁迅最初是以“封建阶级的逆子贰臣”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思想界的。封建大家庭的中落，世态的炎凉，使鲁迅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看到了封建阶级的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因而“毫不可惜它的溃灭”。与此同时，和农民群众的最早交往与亲近，又使鲁了解到“下层社会”的许多痛苦和不幸，以及农民的勤劳、质朴、善良的品格，从而开始把他的视野引向劳动大众，把他的思想深深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

鲁迅的一生，不论是前期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或是后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人民大众。他们极度贫困的物质生活，尤其是他们“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⑩的悲惨命运，以及在这种境遇下造成的愚昧、麻木、迷信等精神的创痛，使鲁迅感到异常痛心和愤慨。因此，鲁迅把改变劳苦大众非人的命运，争取他们的解放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为此，他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和形形色色的黑暗势力斗争了一辈子。他说：“人生现在实在痛苦，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

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⑪鲁迅就是以这种无我的精神为人民大众而工作、生活、战斗的。他常常“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⑫而对于荣誉、地位则毫不介怀。他谢绝了友人为他申请诺贝尔奖的好意，说：“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⑬鲁迅热情扶持、培育文学青年，把生命“碎割在给人改稿子，看稿子，编书，校字，陪坐这些事情上”^⑭而毫不顾惜。他曾说：“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⑮鲁迅对木刻艺术的热情提倡和鼓励，对文艺大众化和汉字改革问题发表的许多精辟见解，无不是着眼于人民大众对文艺的需求。

鲁迅关注并致力于改变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还表现在他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上。早在留日时期，他就十分“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⑯的研究。对于保守、麻木、巧滑、健忘以及愚昧、迷信等国民性的弱点和缺点，鲁迅深感忧虑。他认为，“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⑰因此，他将自己的全部心血，用于改变人们的精神这一艰巨事业上。鲁迅的小说和前期许多杂文，集中揭露和解剖国民性的弱点，把那些沉重地压在“老中国的儿女们”心灵上的历史垃圾，灵魂深处的污垢和伤痕，尽行发露出来，并痛加针砭，正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从精神上唤起整个民族的觉醒。他曾经说到这样一个比喻：

正象一个美人生了遍体的恶疮。若要遮她的面子，当然只好歌颂她的美丽，而讳隐她的疮。但我以为，指出她的恶疮的人，倒是真爱她的人，因为她可以由自惭而急于求医。^⑱

鲁迅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解剖，表现了他关怀人民命运的极为深沉而又灼热的感情。这正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所具有的特点。

由历史所昭示，在现代中国，只有无产阶级和他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真正代表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大众得到翻身和解放。因此，真正热爱人民、关心人民命运，就必然热爱无产阶级、热爱中国共产党，并衷心拥护无产阶级和党的领导。众所周知，鲁迅前期对人民群众的认识是有偏颇的。他热爱人民，却对人民大众精神上的落后面估计得过于沉重；他关心人民的命运，却长时间拘囿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境界，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巨大力量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基本上还没有认识，未能把自己的力量与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紧密结合起来，以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孤军奋战之感。鲁迅在前进道路上产生过的几次苦闷彷徨，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鲁迅后期，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②；肯定和赞扬“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却能够“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③他满怀激情地指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现代中国的“筋骨和脊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④这时的鲁迅，一扫过去对群众革命积极性和力量估计不足的偏颇，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充满了热爱与信赖的感情。这种感情，在鲁迅向党中央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信件中，表达得更为明确：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和拥护。^⑤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将来。鲁迅对党和红军的热爱与衷心拥护，代表了革命人民的共同心声。

鲁迅的这种崇高感情，还表现在他能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自觉地维护党的威信、党的领袖的威信和党的政策的威信。著名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就集中体现了鲁迅的这种可贵的无产阶级品格。在信中，他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怒斥了托派诋毁攻击毛泽东同志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无耻谰言，科学地预见了托派必将堕落在汉奸的可耻下场。他还指出：

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这鲜明的爱憎，表现了鲁迅正是出于对中国人民命运的诚挚的关切，而热爱并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因而，他对党和对人民的热爱，是完全一致的。并且，鲁迅将这种一致提到道德的范畴，揭示了攻击中国共产党将为中国人民的道德所不容这样一项新的道德标准。

诚如冯雪峰同志所说：“党给鲁迅以力量。”当他前期尚未找到党的领导的时候，尽管满怀对人民的一腔热诚，却仍不免苦闷彷徨；只有与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溶为一体，才使鲁迅后期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其战斗更加朝气蓬勃和更加卓有成效，终于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在现代中国，只有把对人民的热爱与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信赖统一起来，在党的领导下谋求人民的解放，才能获得无穷的力量源泉，实现人民的愿望。否则，离开党的领导去侈谈人民利益，定然不能达到目的。因此，鲁迅的光辉实践和他总结的这一道德标准，我们应当牢牢记取。

三

鲁迅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等社会公德方面，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楷模；而在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在对待师生、亲友等方面，也同样树立了表率。

关于鲁迅的尊师爱生，曾有过许多佳话。他的师长，如寿镜吾、藤野严九郎、章太炎等，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他们对鲁迅的影响虽不尽相同，而鲁迅对他们则都一样“执礼甚恭”。即如对少年时代的塾师寿镜吾先生，鲁迅并不满意他那陈旧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但他的“朴质、方正”的品格，仍博得了鲁迅的尊敬。直到一九一五年底，寿镜吾的夫人逝世，鲁迅“得寿师母讣”便立即送輓幛，并亲往吊唁，^②完全以师礼相待。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深情怀念与感激之情，在著名的《藤野先生》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抒发。鲁迅与章太炎先生的关系，集中体现了他处理师弟关系的可贵品格。他从太炎先生学，“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可见鲁迅的从师，首先是考其对革命的态度而兼及学问。对于章太炎晚年的谬误，鲁迅提出过非议与批评，表现了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精神。当章太炎逝世后遭到无聊文人奚落时，鲁迅则抱病撰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文章，给先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允评价，阐发其革命业绩和可贵的革命精神。鲁迅在总结与章太炎几十年师弟关系时说过：

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对当局作媚笑。以后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霭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③

鲁迅这段话，表述了他对新型师弟之道的卓越见解，而他自己正是这方面的模范实践者。他对自己的学生，就继承了太炎先生的遗风，“向来也绝无傲态，和霭若朋友然”；加以他渊博精深的学识，永不衰竭的革命热情和崇高的道德风范，使他成为更加受人景仰的一代宗师。

鲁迅是十分重友情的人。他常为生平有不少生死不渝的至友而引以自豪。他说：

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④

“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以革命大节为基础，建立和发展友谊；也以革命大节为准绳，分友仇、别亲疏；而决不以“一点小事情”为念，“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⑤，这是鲁迅交友的重要原则。在鲁迅众多的友人中，既有几十年如一日相敬如初的老友；也有先友后仇，成为路人或政治上的反对派；还有因意见相左或误会“先闹过，后再再认识的朋友”，^⑥其离合变化，情形十分复杂。但不论那种情况，考其究竟，大都取决于革命的大节：大节同而合，大节异则分。鲁迅与许寿裳等老友间历几十年而不衰的友情，与瞿秋白、冯雪峰、柔石等共产党人的战斗情谊，便是建立在为正义和公道，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共同奋斗的大节之上的。对于政治上堕落或变节的朋友，鲁迅则毫不犹豫地与之断绝交往，甚至给以公开的揭露。鲁迅与“新青年”团体里的胡适、“新潮”社中的傅斯年等人的关系就属这种情形。

鲁迅交友十分诚恳。他对朋友的优点、成绩、进步总是感到由衷的高兴，并给以热情的鼓励和称赞，而对朋友的缺点、弱点或错误观点，则实事求是地给以批评指正，从不溢美或讳饰。鲁迅写过不少纪念友人的诗文，还为友人的著作写过更多的序文。论人论文，都充分坦露出他对朋友的诚恳态度。鲁迅以

挚友的深情，表彰了韦素园默默无闻、甘当“一木一石”的实做精神，对柔石等革命烈士寄予深刻的怀念与崇敬。鲁迅也以诚恳的态度，谈到他对“五四”时期的老友刘半农的看法。他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②对于林语堂，鲁迅同样是希望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③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多次对他进行帮助和规劝。尽管他终未接受鲁迅的忠告，但鲁迅对老友的爱护则是做到仁至义尽了。正因为鲁迅待友以诚，所以他对于那些在朋友之间“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的恶劣倾向十分厌恶；尤其不能容忍无真凭实据的对朋友的诬陷攻击。因此他认为，秉公直言，为朋友辩正洗诬，也是他“交友的道义”。^④

“五四”时期，鲁迅针对中国封建宗法家庭的弊害，对改革家庭、改善长幼、夫妻关系提出过许多积极的主张。后来，他还对这些问题陆续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见解。鲁迅有关家庭问题的言论和行动，是他革命的共产主义的道德的重要内容，同样体现了他伟大人格的一个方面。

我们知道，青年鲁迅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他二十六岁时受母命与朱安结婚。鲁迅曾对许寿裳说过：“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⑤这种没有爱情的结合，当然使鲁迅痛苦，但朱夫人是旧式女子，已经失去奋飞的能力。因此，鲁迅一直负供养之责，让她留在母亲身边，算是对一个旧礼教的牺牲者尽了人道主义的义务。鲁迅的爱情生活，是在与许广平的交往中开始的。许广平曾说：“这也许是我们根本思想——反抗旧社会——一致的缘故，所以才结合起来”。^⑥正因为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政治理想的坚实基础之上的，所以能在战斗的风雨中患难与

共，生死相依；在生活上相互照顾，体贴入微。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鲁迅书赠许广平的这首诗，就是他们坚贞崇高爱情生活的真实写照。鲁迅说过：“革命的爱在大众”。^⑦他十分宝贵许广平对他的爱情，而时常对她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⑧事实确是如此，鲁迅婚后的“新生活”，却实在并非忙于和爱人接吻，游公园，而苦于终日伏案写字”，^⑨真正把夫妻之爱与对革命事业、对大众的爱融合起来，赋予爱情以更充实的内容。

鲁迅一贯关怀和热爱儿童。“五四”时期，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系统批判了封建主义的孝道，提倡“幼者本位的道德”。鲁迅有句名言：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
合理的做人。

这充分体现了他为幼者牺牲的崇高精神。鲁迅就是以这种精神贯注在对儿子海婴的爱抚和教育中。他除关心海婴的饮食疾病外，还特别注意顺其自然，培养活泼、健康、敢说、敢笑的性格。他有时不惜停下手里的工作来陪伴海婴谈笑玩耍。所以许广平说：“他更是一个好父亲。”^⑩唯其如此，竟招致友人的取笑，于是鲁迅写了《答客诮》这首诗：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以猛虎的爱子，说明了战斗者同样有着丰富的怜爱之情。鲁迅在逝世前不久留下的遗嘱里谆谆嘱咐：“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⑪鲁迅晚年，不是为儿子积私产、求虚名，使其坐享父业；而是嘱望儿子独立谋生、量才而用，决不鄙弃“小事情”。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对待子女问题上，丝毫不挟剥削阶级的私有观念而完全出以公

心,展现了他心灵美的重要一面。

在家庭中鲁迅作为长男,对母亲、兄弟也是十分关心体贴的,处处表现了舍己精神。鲁迅说过,他从日本回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就是“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③这“几个别的人”就包括二弟周作人及其妻子。那时周作人在日本学业未满便结了婚,经济上要靠鲁迅接济。后来全家移居北京,所有事务全由鲁迅一人承担。鲁迅买下八道湾住宅,是“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戏”。^④而当时他自己尚无子女,完全是为侄儿侄女们着想的。鲁迅曾经这样称赞柔石:“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⑤鲁迅自己也正是这样。他对家人的体贴友爱,对朋友的忠诚,既体现了中国的传统美德,同时也符合近世新的道德规范。

四

以上,对鲁迅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种种道德行为和道德规范作了粗略的分析之后,我们看到,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身上所集中体现的,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最可宝贵的性格,是一种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高尚道德情操。它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鲜明的阶级性和强烈的批判锋芒。

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⑥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辩护,或者代表被压迫阶级的利益。正如鲁迅所说:“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⑦他所体现的新型道德,正反映着并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斗争和利益,因而与统治阶级的道德尖锐对立,有着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冯雪峰同志说:“他将旧礼教否定

了,然而他有新伦理。”^⑧最初,鲁迅与“五四”时期许多启蒙主义者一样,是用资产阶级的人类之爱和进化论等一类新思潮、新伦理,批判封建旧礼教,为当时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服务。而当鲁迅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便进一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用无产阶级的道德更深入批判封建道德,同时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服务于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从而使鲁迅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进一步升华到共产主义的高度。

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

共产主义道德并非从天而降,它一方面归根到底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⑨“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⑩另一方面,它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继承性,“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⑪鲁迅从青少年时代直至晚年,都重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我们民族的美德和劣根性,他了解得都很深切。他对于我们民族的许多优秀人物,无限景慕,而对国民性弱点的鞭挞也格外深刻有力。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光照下,鲁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而赢得了“民族魂”的崇高称号。

三、以集体主义为核心。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中心内容,是无产阶级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个人关系,判别是非、善恶、美丑、好坏的根本准则。因而它是同以个人利己主义为中心内容的资产阶级德道的本质区别所在。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崇高品格,体现的正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本质的东西。鲁迅的集体主义精神,表现在对社会的关系上,便是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热爱与忠诚,为人民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表现在对个人的关系上,便是对师长、学生、朋友、亲属的尊重、关心和爱护,他人第一,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

重。无私才能无畏，正是伟大的集体主义精神，铸就了鲁迅一副铮铮铁骨，屹立在中华民族的伟人群象之中，成为最为光焰照人的共产主义道德和光辉人格的典范。

- ① 巴金：《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169页。
- ③④⑫⑭⑯⑮⑰⑱⑳㉑㉒ 《鲁迅书信集》第270、1092、967、162、1017、380、952、615—616、217、215页。
- ⑤ 《毛泽东选集》第594页。
- ⑥⑨ 《中国地质略论》。
- ⑦ 《华盖集·忽然想到(十)》。
- ⑧ 《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 ⑩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 ⑪ 《坟·灯下漫笔》。
- ⑬⑮ 《两地书》六二、七一。
- ⑰ 许寿裳：《鲁迅先生年谱》。
- ⑱ 《华盖集·通信(二)》。
- ⑲ 见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

- ⑳ 《二心集·序言》。
- ㉑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
- ㉒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 ㉓ 见《人民日报》1979年6月9日。
- ㉔ 《鲁迅日记》1915年12月3日、5日。
- ㉕㉖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 ㉗ 景宋(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
- ㉘ 《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 ㉙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 ㉚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 ㉛㉜ 许广平：《欣慰的纪念》。
- ㉝ 《且介亭杂文末编·死》。
- ㉞ 《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 ㉟ 《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
- ㊱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 ㊳ 《且介亭杂文·后记》。
- ㊴ 冯雪峰：《鲁迅的文学道路》第10页。
- ㊵ 《列宁选集》第4卷，第352页。
- 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上接 82 页）

赞赏那种人物形象鲜明，情节跌宕起伏，社会意义重大的传统小说，但他并不排斥从五十年代起正式形成一种文学倾向的反传统的“新小说”(Nouveaux Romans)。“新小说”的作者们不致力于内容上的挖掘，而着笔于形式上的追求。它的人物无主次之分，个性模糊，身世不明，很少涉及重大题材，常陷入日常琐事之中。它反对传统小说中用第三人称的写作手法，而多用第一人称，有的甚至采用第二人称。用语常常模棱两可，叙事往

往错综纷云，不仅一般人读起来叫苦不迭，就是知识界也说“新小说难懂”。象罗伯·格里叶(Robbe Grillet)和他的《橡皮》(Les gommes)，米歇尔·比托尔(Michel Butor)和他的《改变计划》(La modification)，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和他的《故事》(Histoire)等，都是在读者中颇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虽然人们对“新小说”提出了不少的责难，但毕竟不能否认它在文学创新方面所作的许多新的尝试。